仅亲自到国会山欢迎我们，还邀请我和我的朋友们走到渥太华之后住在她的家里，虽然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去住成，但她诚挚的心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她用她的心告诉我，她对大法弟子的景仰。有些国会议员的秘书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有一些人，我打电话根本不需要报名字，他们能听出我的声音。他们对我讲的话从未怀疑过。记得当长春这件事发生时，我心情非常难过，尽管这两年多的迫害中，我在给他们讲清真相中，我一直保持平静的心态，所以从没有过非常激动的表现，然而面对长春的屠杀，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情，为国内学员承受如此大的痛苦，还用一颗大善大忍之心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民而感动，我在和一个秘书打电话时，泪流满面，他听到我的声音，根本没有问我如何去证实消息的可靠性，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因为我在两年多的讲清真相过程中以让他充分信任大法弟子所给他提供的消息，和这场迫害的严重性，他根本不需要去证实什么，因为我们是他心目中最信赖的人。就这样通过长期不断的讲清大法的真相，通过我的行动让他们直接充分了解了真实的大法弟子的状态，而这种植根于他们心中对大法的认同，有时根本都不需要告诉他们去做什么，他们自己都去想尽办法而帮助我们。有时，他们甚至都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写给他们的威胁他们不要支持大法的信给我看，并告诉我说，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他们要写信严厉谴责他们，并要求加拿大总理关注此事。有了对大法的进一步了解，这些正义的议员们站出来窒息邪恶在加拿大的迫害，并向更多的善良的加拿大人传播大法的真相。我理解到，当我们能充分地向不了解真相的人讲清了大法的真相，让他们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他们内心深处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有一位在国会里非常有声望的议员，我和他接触过非常多的次数，他对大法的了解和认同已经改变了他日常处理问题的方式了。有一次，和另一位他的也是国会议员的同事谈起他时，那位同事感慨地说，“JOHN 在国会里处处以‘真、善、忍’作为他生活的准则，虽然我不认为他是法轮功学员”。又是这位议员，顶着巨大的压力，两次邀请师父来加拿大访问并公开讲法。他们这种他们内心深处的改变给他们未来得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就象师父在华盛顿讲法中说，“所以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不能够不为其他众生负责，我们不能不为其他众生将来得法负责，我们不能不为其他众生将来得法奠定基础，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你们那一体系中的生命。”师父还讲“讲清真相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只是一个揭露邪恶的问题。我们的讲清真相是在挽救众生，同时还有你们修炼中的个人提高与去执著等因素，还有大法弟子们在修炼中为法负责的因素，同时还有你在最后圆满中怎么样丰满你自己的那个世界等等这些问题。”

多伦多在加拿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他的人口和在国家的位置都非常重要。邪恶对这里的控制也是非常猖狂的。在镇压开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没有突破旧势力的安排。约见市议员的要求一次一次被拒，理由是这是联邦政府的外交事务，和市里没有关系。然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却不顾一个外交使节的规矩，一次一次地跑到市议会里给他们施加压力。我们对市里的讲清真相工作一直没有进展，甚至 2000 年在多伦多市政广场举行庆祝活动的要求也一再被拒。如何能破除邪恶势力的安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使命。2000 年底，多伦多举行大选，虽然对政治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学员，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能够让多伦多的市议员们了解大法真相并破除邪恶在这里的破坏，我们在他们敞开大门接见选民之际，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讲清大法的真相。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见了 30 多个议员候选人，后来他们多数都当选了下一界的市议员，真相如潮水一般涌到了他们眼前，邪恶的谎言再也包不住了。大选之后，我们一次一次地约见那些市议员，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去多伦多市政厅。其中一位市议员的夫人是中国人，我们向她讲了大法真相，在后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邀请她和议员本人来学员家里作客，同时给他们放大法真相的录象片，他们对大法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位议员多次公开支持大法并帮助我们在市里申请场地。我们 2001 成功地申请到了在市政广场举办“世界法轮大法日”和第一届“多伦多真、善、忍日”的许可。活动异常成功，由于这是得到市政府支持的活动，来自社会各界上千人参加了活动并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其中还有危地马拉总领事及夫人和一双儿女，还有 3 个国家的驻多伦多外交使节，许多国家的领事还帮我们推荐了他们在多伦多的社区，成了一个真正的各民族同庆真善忍的聚会，天空的巨大法轮持续了 5 个多小时。这对邪恶是一个承重的打击，后来我们又一次在一年之内申请到了在市政广场搞活动的许可，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亲自向多伦多市长施加压力，并鼓动当地的不明真相的华人团体要取消我们的活动，然而遭到了拒绝。去